在文化领域为南人争一席之地
——谈沈约的名山事业

汪 春 泓
(岭南大学 中文系, 香港)

摘　要：在中国南朝时期,以沈约(441—513)为代表的南方土著文化名士,和来自北方的高门士族如王谢子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较量、竞争关系。而透过沈约的《郊居赋》与前辈谢灵运(385—433)之《山居赋》之比较研究,恰好可以揭示沈约文史创作及追求的复杂心理。

关键词：宋书;郊居赋;山居赋;三吴
中图分类号:I 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4-0055-12

按《宋书·自序》,沈氏之沈约家族这一支是典型的江南土著,研究沈约,要破除几个迷障,譬如笼统地谈论其南人身份,这会导致误解。

作为江南士人,沈约身份特征包括两重含义,一从自然地理意义而言,在沈约身上,其南人特质十分明显,理应归诸南人范畴;而自人文地理角度来看,对沈约则不能简单地以南、北来区分。理由在于,自秦汉以来,察中国学术、文化,南北已经水乳交融,渑淄难分。汉末以来,江左吴地学术文化之发展,虽然与北方许、洛等地存在着时间差,但是,经过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宋书·何尚之列传》曰:"中领军沈演之以为:'晋迁江南,疆境未廓。'"①北方士人迁徙江南,则缩小了南北距离。《三国志·吴书·华核传》载孙皓答云:"当飞翰骋藻,以越杨、班、张、蔡之畴。"②在三国时期,关于文化学术或文章领域之偶像人物,吴地士人与北方曹魏阵营几乎形成共识;《宋书·顾觊之列传》曰:"……乃以其意命弟子愿着《定命论》,其辞曰:……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着书立言,咸以为首,世之论者,多有不同。"顾觊之也是江南土著,此说明士人所接受精神食粮,南北大体上并无差异;《宋书·沈攸之列传》叙述沈约之同乡:"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此乃南北士人文化、学术及文章交流畅通的基础,也是南北之间并无违和感之根本原因。故而,基于对沈约复杂的"江南意识"之思考,本文将为之略作分析和阐释。

一、赓续北方主流学术、载录晋、宋以来史实的大文化使命

中华主流文化本不分南北,按《宋书·自序》,沈约之父沈璞,沈璞之父沈林子,乃沈田子之弟,而沈渊子、沈云子、沈田子、沈林子、沈虔子均为沈穆夫之子,沈穆夫之父乃沈警,沈警出自沈仪。《宋书·自序》中,沈约记述先祖:"(沈)仪笃学有雅才,以儒素自业。"而汉末形势,令沈约关注者在于:"经术道弛,士少全行。"沈仪之子沈警则:"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亦通《左氏春秋》。"此反映沈氏重视儒家经学,而且《春秋左氏传》几乎是其渊源有自之家学,沈约立身处世,也展现其饱学鸿儒之一面。

而依照《汉书·艺文志》"七略"之分类,在"六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汪春泓,男,浙江嘉兴人,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1900 页。
② 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67 页。

艺略”之“春秋”类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此即《春秋左氏传》也,在后世开出“史学”一部者,非《春秋左氏传》莫属也,自《春秋左氏传》至《太史公书》以降,从《春秋》类至四部或四库之经子史集或经史子集之“史”,为华夏民族建立起叙事传统,沈约深受此一传统影响。《宋书·自序》云:“璞尝作《旧宫赋》,久而未毕,浚与璞疏曰……浚重教曰:‘……吾远惭楚元,门盈申、白之宾,近愧梁孝,庭列枚、马之客,欣恧交至,谅唯深矣。薄因末牍,以代一面。’”沈约父亲沈璞与始兴王刘浚书信往还,其中刘浚谈及“吾远惭楚元,门盈申、白之宾”;《宋书·谢灵运列传》所收入谢氏作《撰征赋》云:“观终古之幽愤,怀元王之冲粹。丁战国之权争,方恬心于道肆。学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类。”沈约《赠刘南郡季连诗》云:“鸿汉景德,盛楚连徽。灼灼中垒,入奥知微。”①此均反映当时楚元王一系深为士大夫所熟悉,而刘向、刘歆是楚元王后人,向、歆之学,更为士人耳熟能详,沈约亦当以结撰史书和传承学术为己任。

《梁书·沈约列传》云:“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可见在齐初,沈约从事四部图书校勘之役,当精于版本目录及文献之学。《梁书·沈约列传》云:“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沈约著述繁富,然则其一生成就最大者,当推史学及文章之学。关于沈氏学风,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之《各家总论》云:“六朝文之传于今者,以沈休文为最多,而《宋书》实其大宗也。《宋书》为《三国志》以下最古之史,叙事论断,并有可观。其纪传叙论亦能夹叙夹议,各有警策。蔚宗而后,此实称最。”②刘说公允,故而,《宋书》大体上可以认为出自沈约之手笔。

《宋书·范晔列传》曰:“晔狱中与诸侄书以自序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理,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欲徧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显示范晔推崇《汉书》诸《志》,而《艺文志》当属翘楚;而《宋书》之八《志》,沈约也遵循范晔意向,一则此八《志》踵武前人,大致上是班固《汉书》之续作,体例亦仿照《汉书》,凝聚一个朝代的意识形态,诸如律历礼乐天文州郡百官,当然也包含宣扬其执政合法性的符瑞五行。《南齐书·檀超列传》记述建元二年檀超、江淹修史所立十志,也依班固③,此在汉末以后,俨然成为普遍体例。

《宋书·乐志二》载录姑洗厢作《大会行礼歌》二章,其词曰:“大哉皇宋,长发其祥,纂系在汉,统源伊唐。”刘裕之宋朝,自视为刘汉之延续,南北畛域,泯然无存。沈约在《宋书·自序》里突出时间点:东汉光武帝时期,沈氏一系徙居江南,汉末名士盛孝章是沈氏外祖,这都反映他显示沈氏与刘汉及刘宋之关系,由此令沈约之思想渊源与《史》、《汉》存在不解之缘。谢灵运《山居赋》曰:“詹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④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云:“问: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闭户自精,开卷独得,九流、《七略》,颇常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⑤所谓九流、《七略》和六艺、百家,亦可视作梁武帝炫耀学有根柢。据此可知,当时士人均奉《汉志》为圭臬,所阅读之书目,关乎前汉及之前者,亦大致不出《汉志》之范围,而浸淫于共同阅读对象——所谓六艺、九流等,经其熏陶,士人在文化上,则地不分南北,人不问所自,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所哺育而成,信奉共同的伦理道德、人生价值及审美标准,也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并渔猎于共同的知识体系。

沈约既有天师道家学渊源,后又受佛学影响,然而,他三朝为官,在仕宦生涯较多呈现儒家特

① 《梁诗》卷六,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629 页。
②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0 页。
③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983 页。
④ 《全宋文》卷三十一,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608 页。
⑤ 《全梁文》卷四十二,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3193 页。

征。观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沈约所作乐府歌辞甚多①。在司马迁所创立八《书》基础上,《宋书·志序·律历上》指出:“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所以沈约《宋书》将《汉书·礼乐志》析为《礼志》和《乐志》,为《汉书》补苴罅漏,此与晋傅咸、荀勖以及齐王融、谢朓等相类似,沈约这些作品部分出于重振礼乐目的,譬如郊庙歌辞主要用于朝廷仪轨、宗庙祭祀,迎日步气,敬天娱神,彰显国家之雍容祥和,并迎送荐享祖宗神明,以期神灵长久庇佑。其间涉及乐之古今、夷夏、新旧、淫正、雅俗等问题,其用意、立场与北方儒者大致接近,当然也有差异,此乃受“四部图书”浸淫所致,亦是功到自然成的结果。

按沈约《长歌行》:

> 连连舟壑改,微微市朝变。来功嗣往迹,莫武徂升彦。局涂顿远策,留欢恨奔箭。拊戚状惊澜,循休拟回电。岁去芳愿违,年来苦心荐。春貌既移红,秋林岂停蒨。一倍茂陵道,宁思柏梁宴。长戢兔园情,永别金华殿。声徽无惑简,丹青有余绚。幽钥且未调,无使长歌倦②。

此诗感物伤逝,感喟人世无常,其间所使用意象,如“茂陵道”“柏梁宴”“兔园情”及“金华殿”等,均出于《史》《汉》,虽是南朝作者心境,却借用前汉景物、故事,此在沈约作品里实具代表性。因而,在文化修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及抒情格调诸方面,沈约与他之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周秦汉魏文明融合无间,他仰慕、热爱传世文献中的主流文化,且自幼就陶醉其中,作为一个博学之士,被源自北方的强势文化所淹没,因而将沈约作品与北方士人手笔相较,亦几乎难以察觉其南人特征。可以认为,作为自然之子的沈约被遮掩于其后天文化习得,如果将沈约放大来观察,若置其人于中国古代史学史、文章学史以至诗歌史中,其成就、贡献与先贤相比,也并无不谐之处,此正是扎根于中华文明深处的必然结果。

二、江南承平所熔铸的沈约“三吴”地理概念及地域自尊意识

沈约先祖是东南豪士,《宋书·自序》沈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宋书·沈演之列传》记述:“上怒,下诏曰:‘……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豪士、豪家或土豪,在地方拥有势力,如鱼得水。个人与土地连结在一起,家乡水土、气候、食物、景色甚至泥土气息等,还有人文传统,从物质和精神上滋养、形塑其子民,个人自然深爱家乡,产生强烈的乡土意识,成为乡邦文化之代言;另则,豪家树大招风,西晋陆机撰《豪士赋》曰:“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盛而不阙。”③盛极必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豪士”满怀恐惧感。此两种复杂心理交织在一起,这在沈约身上亦有体现。

《宋书》卷五十四末云:“史臣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①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② 《梁诗》卷六,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14 页。
③ 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1 页。

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此凸显沈约南朝地理概念,首先,沈约所标举“江南”地理指称,先压缩为“荆、扬二州”①。其地一西一东,既一体同功,又互为犄角,《南齐书·州郡志下》云:“江左大镇,莫过荆、扬。”此在沈约心中则亲疏有别。二者分而言之,荆楚兵燹频仍,几乎沦为废墟。而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约三十九年来,长江中下游人民休养生息,荆楚也恢复生机,“盖东西之极盛也”。晋、宋以来,在南朝战略、军事及经济层面,此二州占据重要地位。《宋书·谢灵运列传》载谢灵运所作《撰征赋》,其序曰:“皇晋囗囗河汾,来迁吴楚。”其词有曰:“晋申好于东吴,郑凭威于南荆。”都点出了荆、扬二州实居东晋、刘宋之荦荦大端。由于南北对峙,荆楚之地更居险要,并且沿流而下,荆楚能够拱卫或威胁扬州及朝廷之安宁,所以必须由亲信据守。《宋书·武二王列传》云:“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刘裕遗诏令诸子轮流把守荆州,若外人在位,他心存疑虑。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郡王刘义宣任荆州刺史等职,文帝先赐中诏指荆州及周边地区为“西土”;《宋书·刘延孙列传》记载:“孝建元年,迁丹阳尹。臧质反叛,上深以东土为忧,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置佐史。”《宋书·孝义列传》亦曾记述“东土饥荒”,故此,以西土、东土指称荆、扬二州,当时已成朝野习语。《宋书·武二王列传》云:“义宣与质相失,各单舸迸走,东人士庶并归顺,西人与义宣相随者,船舸犹有百余。”所谓东人、西人,恰与东土、西土相对应,大致指长江中、下游人民之分。关于荆、扬二州政治势力之消长,《宋书·何尚之列传》云:“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扬州比荆州更重要,而面对北方强敌,荆、扬二州本应是合作互援的关系,惜乎二者力量若不均衡,就会手足相残,无论朝廷如何部署,此二州之间矛盾,却堪称无解。

《宋书·文五王列传》云:“至是太宗与建安王休仁诏曰:‘人既不比数西方公,汝便为诸王之长。’时(刘)祎住西州,故谓之西方公也。”此“西方公”指刘祎任江州刺史,以雍州直面关、河,属地理要冲,雍州军事重要性远在江州之上,因“西方公”凡劣,遂被投闲置散于江州②。而西土荆楚若风吹草动,则会引起下游朝廷局势之震荡,而南朝政治之危机,往往就是由东、西两端互相猜忌和角力所招致,此乃当时政治结构性矛盾之所在,也注定东晋、刘宋国祚不永,危机频发。

其次,上述“史臣曰”谓“扬部有全吴之沃”,显示沈约倚轻倚重,在刘宋疆域之东部,吴地占有举足轻重地位,而所谓“全吴”正折射出沈约乡邦意识。上述“史臣曰”采取由远及近叙事方式,凸显沈约“江南”边际之所在,也正是其心灵家园之所系。按本《列传》,传主有孔季恭、羊玄保和沈昙庆,孔季恭,会稽山阴人,从高祖讨孙恩,在平定桓玄之后,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后出为吴兴太守等;羊玄保祖先太山南城人,曾除临安令,曾为丹阳丞,后任会稽太守,又徙吴郡太守;而沈昙庆,吴兴武康人,先出为余杭令,亦曾任徐州刺史。此三传主之出生、任职区域大致不出江左范围,甚至多属作者沈约家乡吴兴武康及邻近地区,故此,历史上,沈约较早厘定江南核心区域之范围,世所谓三吴(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概念,则已呼之欲出③。《宋书·自序》有“时三吴水淹”之说;《宋书·孝武十四王列传》记述:“三吴晋陵并受命于(孔)觊。”《宋书·沈攸之列传》云:“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宋书·徐湛之列传》云:“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宋书·吴喜

---

① 《盐铁论》卷第一《本议》第一云:“大夫曰:‘……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荆、扬并举,而同书卷第一《通有》第三则指:“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此说明在汉代就以江南与荆、扬属二而一之关系。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3 页,第 41 页。

② 庾悦“上表陈之曰:‘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

③ 《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曰:“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44 页。

列传》记述宋明帝诏曰:“及泰始初东讨,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宋书·隐逸列传·戴颙列传》载:“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往,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故此,在沈约看来,“三吴”代表江南,也就是典型的江南。《宋书·顾琛列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此说中涉及会稽、吴兴乌程,而吴郡是典型的吴音方言区,由此可证沈约认为三吴为江东也即“江南”之中心,甚至是南朝最富庶的区域,寄寓沈约浓厚的乡邦情结。

至于扬部行政区划虽屡有变更,但从整体而言,自西晋永嘉南渡以至东晋太元之世,近百年许,除却孙恩作乱,再自平乱以至宋大明年间,时间跨度约有七十二年, 此一区域安定繁荣,尤其“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按会稽地理范围,据《宋书·州郡志一》记述:“秦立,治吴。汉顺帝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会稽移治山阴。”区划更迭,导致《史》《汉》有时混淆吴和会稽,所以,“会土”实际包括《宋书·州郡志一》中 之“三吴”范畴,所述“带海傍湖”,盖指今日之东海及太湖流域,亦佐证其方位属比较狭义的“江南”概念,大致指环太湖地区,也就是如今苏南、浙北之濒临东海部分,尤其是沈约家乡之杭、嘉、湖及邻近地区。其土地之肥沃,远超长安附近“鄠、杜之间”,《宋书·州郡志一》首列扬州刺史(王畿所在),其次为丹阳尹,由于建康在此郡。此后便是会稽太守、吴郡太守和吴兴太守,可见三吴重要性仅次于京师、王畿;萧子显撰《南齐书·州郡志上》亦一仍其旧。故察上述叙述,可以感知沈约家乡自豪感,实乃缘于三吴区位之优势。

许倬云撰《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指出:“由西京到东汉,长江流域逐渐成为国力所在,此点已成为一般常识,可无赘说。”①《宋书·自序》云:“时天下殷实,四方辐辏,”《宋书·鲍照列传》记载鲍照为《河清颂》云:“……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阿纨綦组之饶,衣覆宗国;渔盐杞梓之利,傍赡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惭德;宫宇宏丽,三川莫之能比。”宋朝繁盛富足,已经陵轹周秦两汉,此令南朝士人自信、自尊,无所畏惧,足以傲视侨居江南的所谓高门士族。

三、南北竞胜情结与沈约文章成就及风貌

沈约《悲哉行》曰:“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②身为三吴之士,沈约乡土观念极强。而至宋代,门阀政治余焰尚炽,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指:“孙吴以来,江南文化所被稍广,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③《宋书·宗越列传》云:“宗越,南阳叶人也。本河南人,晋乱,徙南阳宛县,又土断属叶。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元嘉二十四年,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此间南阳之叶与次门于宗氏究竟有何差异?实际上它决定其人门第之高卑,范觊之“点越为役门”,则泯然众人矣,所以宗越孜孜以“求复次门”,则可以跻身士族。

钱大昕《吴兴闵氏家乘序》指出:“魏晋六朝,取士专尚门第,由是百家之谱皆上吏部。”④《南齐书·贾渊传》云:“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也……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

建武初,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

---

①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之《历史编 魏晋隋唐五代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85 页。
② 《梁诗》卷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21 页。
③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7 页。
④ 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序言》,《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9 页。

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求……中兴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琅邪王氏之王俭和王晏热衷于谱学,要捍卫高门世族利益,不让他者染指。但是,人口迁徙,土断出现混乱,使此腐朽的门阀政治日益遭遇挑战,最大的压力就来自江南之土著。《宋书·顾觊之列传》云:“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为维护南士人格尊严,吴郡吴人顾觊之发出正义之声;《南齐书·文学列传》记载:“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此正显示被压抑者之愤怒,他们不肯屈服于从北方南来的所谓士族,要与之一争高下,导致南北士人互有“非我族类”之隔阂。

《宋书》列传第十二“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凡此诸子,并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将由庇民之道邪。”

《宋书·宗室列传》云:“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

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考证:“宋高祖兄弟世为彭城绥里人,自其曾祖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宋书》所谓楚言者,指彭城郡言之也。其地为江苏徐州府铜山县。以其越在江北,密迩胡虏,侨人杂处,号为伧楚。故南朝人鄙夷之如此。”①江北较之于江南,南迁者属于北人,而在江南人眼中,其音楚,其举止则鄙拙,实难望江南“雅道风流”之项背,士人坚守江南文化本位,如沈约等则将伧楚一律视作为北来者。而作为闯入者,“伧楚”言语举止均令南人鄙视,并且在文化上,他们亦并无优势,崛起的南人群体自然要与之抗争!

《宋书》卷八十二载:“史臣曰:……非为徐乐、严安,偏富汉世;东方、主父,独阙宋时,盖由用与不用也。”从才华和人之主体性而论,东方朔、主父偃显然优于徐乐、严安,虽然假借汉武帝朝之人物,然而为宋时人才不彰,沈约发出江南“士子风流”要扬眉吐气之心声。《宋书·孝义列传》所记载的传主既非郡望,也非豪族,先分别胪列:龚颖,遂宁人;刘瑜,历阳人;贾恩、郭世道、严世期,会稽人(何子平,世居会稽的庐江人);吴逵、潘综、孙法宗、卜天与、卜天生,吴兴人;张进之,永嘉人;王彭,盱眙人;蒋恭、许昭先、吴国夫,义兴人;徐耕、余齐民,晋陵人;范叔孙,吴郡人;孙棘,彭城人。据此可知沈约所表彰的孝义之士,均出自大概念之“江南”,尤以三吴为主,本传之《潘综列传》引述吴兴太守王韶之赠诗曰:“俾是下国,照辉京华。”褒扬潘综为北人所不及;本传末,沈约感慨:“史臣曰: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尖锐地讽刺晋、宋以来所谓士族、世族乏善可陈,倒是这些出身卑微的人,却忠孝兼美,感天动地。一部《宋书》寄托着沈约睥睨北人之豪情,即使王、谢子弟,在沈约眼里,也大抵不脱凡夫俗子之气。

首先,沈约此种乡邦意识体现在为江南民歌争取乐府之地位。《宋书》列传第十五“史臣曰:选贤于野,则治身业弘。求士于朝,则饰智风起。”沈约相信用人之道,当选贤于野,这个野倾向于土著人才,消弭门第高下之界限,竭力破除士族之特权。并且高扬儒家道统,以抗衡不可一世的高门士族。承接上述“史臣曰”,沈约云:“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尚有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这些硕学鸿儒比挟“玄学”以自矜的北方士族,更属为学之正道,这就动摇了士族学术霸权。

南朝宋、齐时期,琅邪王僧虔、王俭叔侄把持郊庙祭祀等礼乐建设,排斥江南文化对固有传统

①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4 页。

秩序的冲击,自然要遏制乐府新变。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八)引吕氏说:"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①,汉代音乐分雅、俗,其分野主要表现在"志"与"情"各有侧重。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分设《明诗》和《乐府》篇,实际上大致可以对应太乐令丞和乐府,王易《乐府通论》指:"然乐府之词,有异于后世之诗篇矣。诗篇尚雅,而乐府则兼采于俗;诗篇贵精,而乐府则时杂乎粗。"②而对于南方乐曲的兴起,刘勰也持"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的意见③。

而沈约却兼包雅俗,居南北之间,不轻分轩轾。《宋书·乐志一》叙述汉末杜夔精于雅乐,"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宋书·乐志一》云:"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对于吴国文化品位,此有所肯定,江南乃赓续华夏文明的重要分支,足以与曹魏分庭抗礼。甚至对来自江南民间的歌谣,沈约也珍视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宋书·乐志一》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随着南风势强,吴歌杂曲等也会晋身庙堂之上,而所谓"稍有增广",乃沈约为之开方便之门。《宋书·乐志一》述及吴声歌曲,计有下列九种:《子夜》《前溪》《阿子》《欢闻》《团扇》《督护哥》《懊憹哥》《长史变》《读曲哥》。此种载录与沈约吴人身份相关,与之相映成趣者,在《宋书·乐志》中,西曲则相对被忽略。

对于此种史家卓识,沈约《宋书·志序》曰:"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有感于前代史家重《雅》轻《郑》、重声轻义,虽有乐府之设置,然而,由于士大夫对民间通俗作品深怀歧视,尤其鄙夷江南吴歌西曲,导致遗珠之憾,譬如乐府铙歌旧曲虽存,文字意义则凋零残缺,沈约则要纠正此种积习偏见,而非摒弃不顾,因此何谓"淫哇"?沈约所持尺度就比较宽容,《宋书·乐志一》云:"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哥曲》,并列于乐官。哥词多淫哇不典正。"即使"淫哇",沈约仍要载录这些乐章,体现其细大不捐的史家眼光④。故而,《宋书·乐志》详细记载汉魏晋乐府之分类、曲名及全文,此为保存史料,尤其对于文学史撰写,其价值无可估量,而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沈约奠基之功则不可没也。

其次,沈约有跻身文学史意识,胸怀与北方名家一较高下的自信。《陈书·陆琼列传》云:"第三子从典,字由仪。幼而聪敏。八岁,读《沈约集》,见回文砚铭,从典援笔而拟之,便有佳致。"文人编辑文集,说明时人追求立言不朽。而以文鸣于世,必然要在时空网络中找到一己之定位,在某时代,作家会以同时代或前代名家作为参照,而拟作与同题写作,都体现作家"尚友千古"的学习热情,以及心雄万夫的竞争意识。

在沈约时代,佛教影响朝野甚巨,故而,在佛教领域之声名,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其人政坛、文坛之地位,此种显学竟然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后世读

---

① 收录于《四库全书》卷八五《史部·目录类一》,共十卷。

② 王易著,孙尚勇整理:《乐府通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3 页。

③ 《文心雕龙·乐府》篇。

④ 《宋书·乐志一》记述宋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他是雅乐捍卫者,他愤慨于:"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按音曲与之相配合的乐府诗,自晋宋期间,呈现新变之态势,站在保守立场,王僧虔对此十分厌恶,而沈约则与王氏针锋相对。

者尤当留意焉。

根据《影印本宋碛砂版大藏经》本僧佑撰《弘明集》收入论文作者有:宗炳、孙绰、何承天、颜延之、慧远法师、何尚之、支道林、沈约等①;

《影印本宋碛砂版大藏经》本道宣撰《广弘明集》则收入论文作者有:沈约、颜延之、周朗、道安、慧远、谢灵运等②。

若论宋代人物,此二书所瞩目者可谓皆一时之选,也与沈约《宋书》之人物月旦,存在着高度暗合关系,严耕望先生《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第四章《东晋南北朝高僧之地理分布》指出:“总括言之,北方高僧日少,尤其古豫州之地空无人迹。长江沿流及浙东会稽之地日盛。此主要由于政治是否稳定,影响经济盛衰,致僧徒之散聚……而驻锡南方者亦绝大多数为北僧之南徙。”③梁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一《明律》之《宋吴闲居寺释僧业》云:“三吴学士,辐凑肩联。”④可相印证;《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所遴选作者,正反映严耕望所描述的地理分布特点,其人活动大致围绕三吴之中心,或以江州庐山亦为佛学之一大集结。

而跨“文义”与佛教之两端,从文章学而言,《宋书》仅为文章大家谢灵运和颜延之各占一卷单独立传,其地位似可与《汉书》中《司马相如传》及《扬雄传》相仿佛;而就史学而论,范晔虽与刘湛同传,但在《宋书》内,《范晔传》所占篇幅较大,叙述也首尾完整,《宋书》此种详略安排,实与上述沈约最看重史学及文章之学,可谓桴鼓相应者也。

关于《宋书·谢灵运列传》之文末“史臣曰”,则可视作一篇文章小史或诗歌小史,展现沈约文学观。从《风》、《骚》以下,“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士辈出,其间沈约独标贾谊、司马相如上接屈、宋,令辞赋写作“情志愈广”,按《宋书·志序》云:“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说明沈约诗文写作推崇“诗言志”和“诗缘情”相结合,且“平子艳发,文以情变”,《宋书·乐志一》有“情变听改”之说,此进一步证明沈约的抒情有趋向“艳情”特点,这恰好是受江南民歌影响使然,也显示南朝文学绮靡之趋势。“史臣曰”谈到文坛近况:“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⑤颜、谢正是触发沈约竞争意念,并由此令自己优入文学史之列的突破口。

在文章学史上,沈约树谢灵运为主要竞争对手,是有原因的。一则,谢灵运先祖谢安、谢石是东晋功臣,而沈约之祖父辈沈田子、沈林子则是刘宋功臣,分别为晋、宋功臣之后,由于面对一个王朝情感特殊,且谢氏源出于北方陈郡,而沈约则属江南土著,显然内含南北角力的微妙心理。

《宋书·谢灵运列传》云:“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宋书·颜延之列传》云:“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

上述“江左”一词,写出由北南来士族执江南文坛之祭酒,并且王、谢子弟傲慢自负,《宋书·谢灵运列传》记载谢氏作《撰征赋》,则把东晋视作北方正统之南徙,坚持“华夷有殊”观。其本传记述:“上书劝伐河北,曰: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此种轻蔑态度刺激南人乡邦意识,面对谢氏贬低江南,沈约不甘俯首臣服。而关注谢氏,尤其念兹在兹乎谢灵运,故此,谢灵运堪称沈约名山事业主要竞争对手,沈约写作步趋谢氏,实有迹可寻者也。

谢灵运曾造《四部目录》,而《梁书》本传称“校四部图书”;谢灵运曾受宋太祖之命编撰《晋书》,“书竟不就”;而沈约则广涉晋、宋、齐、梁史之撰写,尤以《宋书》鹰扬史林! 在史学成就上,沈约远胜谢氏。谢灵运开创山水诗写作,齐梁诗

---

① 僧祐:《弘明集》(《影印本宋碛砂版大藏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道宣:《广弘明集》(《影印本宋碛砂版大藏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8 页。

④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429 页。

⑤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列传”云:“史臣曰……颜、谢并起,乃各擅奇。”

坛有“沈诗任笔”之誉,而且沈约是南齐永明声律论的发明者之一,沈约既为谢氏立传,又熟稔谢诗,唐皎然《诗式序》提到“早岁曾见沈约《品藻》”云云,沈约论诗,谢灵运当尤为关注,惜乎此书不传①。虽然在大小谢之间,沈约更倾心于谢朓,然其《休沐寄怀诗》所谓“园禽与时变,兰根应节抽”②,却脱胎于谢氏《登池上楼诗》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者均写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内在生机,沈诗实可櫽栝谢诗。

上述《宋书·谢灵运列传》末之“史臣曰”,沈约评骘谢氏:“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古来名篇佳句,或与四声理论暗合,然则即使名家如汉魏晋宋之大家,亦惜乎“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对此发明,沈约认为谢灵运、颜延之等均懵懂无知,自己则力压此辈一头③。故此,李延寿撰《北史·文苑列传》指出:“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④佐证沈约确有实力挑战颜、谢之文坛地位。

谢氏《山居赋》和沈约《郊居赋》乃均属二者一生之大手笔。《宋书·隐逸列传》云:“又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祖述《论语·微子》,故而以赋写居,盖与作者“穷则独善其身”心态有关,陶潜《饮酒二十首》之一曰:“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⑤在魏晋六朝赋史上有:曹植《闲居赋》,晋庾阐撰《闲居赋》《狭室赋》,束皙《贫家赋》,潘岳《闲居赋》《狭室赋》,以至庾信《小园赋》等,形成一个主题,作者似乎要作别这个纷扰世界。《宋书·何尚之列传》云:“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着《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可见无不表达退隐之情。

沈氏以谢氏为文章敌手,比较《山居赋》和《郊居赋》,既发现关于隐二者存在歧见,也可借此一窥沈约所抒发更曲折的内心世界。《宋书·谢瞻列传》云:“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谢灵运“为性褊急”,谢混、谢瞻善意规劝,可能并无实效。

《弘明集》卷第十二《支道林法师与桓玄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云:“得使山居者骋业,城傍者闲道。”⑥此书反映官府要僧人登记名册,干涉其修行,令僧人骚动不安,支遁向桓玄申诉,指出僧人已处社会边缘,官府不必侵犯其生存空间,因此,所谓“山居”“城傍”,都指游离于社会中心,此辈息心红尘,可谓与世无争者。所以,谢灵运写《山居赋》,而沈约则继作《郊居赋》,此乃分别对应于支遁所谓“山居”和“城傍”,二者关系之密切,亦昭然若揭矣。

支遁撰《天台山铭序》残篇云:“余览《内经·山记》云:‘剡县东南有天台山。’”⑦因而,天台山为名士所向往,实与支遁宣传颇有因缘,孙兴公赞美“支道林拔新领异”⑧,他之所以撰《游天台山赋》,或从其《道贤论》推崇支遁可窥端倪⑨。全赋凸显:“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也。”在孙绰心目中,此山俨然高士仙游之地,其所谓“神”反映东晋释、玄相济之特点,按《弘明集》,关于神灭或不灭,晋、宋时期曾讨论激烈,孙绰《喻道论》认为至道超乎中土尧舜《老》《易》之上,故此,其所谓“道”显然偏于佛教之道⑩。而天台山正无处不闪耀佛教神理的辉光,《南齐书·乐志》云:“永明六年,赤城山云雾开朗,见石桥瀑布,从来所罕睹

①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② 《梁诗》卷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40 页。
③ 参见《南齐书·陆厥列传》,沈约对声律之发现,有详细的叙述。
④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785 页。
⑤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58 页。
⑥ 僧祐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05 页。
⑦ 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09 页。
⑧ 《世说新语笺疏》,第 223 页。
⑨ 《全晋文》卷六十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1813 页。
⑩ 僧祐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第 145 页。

也。山道士朱僧标以闻,上遣主书董仲民案视,以为神瑞。太乐令郑义泰案孙兴公赋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又省焉。”此表明孙绰《游天台山赋》产生广泛影响。

《宋书·谢灵运列传》云:“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曰:‘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两绝,守分养命,庶毕余年……’”此表明自己岂止“居非郊郭”,甚至被刘宋新朝迫害,遁逃于世外,换言之,自己从“城傍”,进而至于“山居”,几无立锥之地,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是以谢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足见他回应支遁“山居”、“城傍”之说,他选择前者,佯装与社会脱节,自己是零余者,故有“抱疾归山”之谓也,因而谢氏所谓“隐”,乃非隐,不过是变换一种入世方式,且高调地向朝廷宣示抗议。

作为谢安朋友,孙绰《秋日诗》云:“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①自晋入宋,谢氏家族失势,谢氏《山居赋》云:“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异于纬牒,验感应于庆灵。”他接续孙绰《游天台山赋》,凭借天台等神异,以寻求慰藉心灵之所在,可是,与孙绰不同,《山居赋》备述“铜陵之奥”“金谷之丽”,营造现世西方乐土,谢氏意在借山居与朝廷之间构筑对峙的张力,以“非毁执政”,发泄内心愤恨,并向新朝摆明不合作姿态。然而,孙绰赋具有奇幻及地理博物之性质,相对于此种想象式书写,谢氏则具有更多写实成分,此与他富有“寻山陟岭”经验,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开创山水诗一体的缘故。

谢氏张扬恣肆,而沈约一则有江南人低调内敛性格,另则其家族多难,且宋齐梁三朝,朝政险恶,目睹无数血腥杀戮,令沈约应对世事尤为谨小慎微。故而,《宋书·隐逸列传序》就讽刺谢灵运“穴处岩栖”,其《郊居赋》之隐所凸显关键词:羽戢、鳞藏,意在寻求远祸避难之居所。有鉴于谢氏山居,崖岸自高,却不得善终。因此,他选择支遁所谓“城傍”,也就是郊居,以求圭角尽销,和光同尘,则与世浮沉矣。沈约《酬谢宣城朓诗》云:“王乔飞凫舄,东方金马门。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晨趋朝建礼,晚沐卧郊园。”②大隐隐于金门,然则避免招惹世人之侧目,不重蹈嵇康、谢灵运辈之覆辙。此种命题式作赋透露沈氏与谢氏深层渊源关系,设若没有《山居赋》,则《郊居赋》不会产生。

写作《郊居赋》,其主旨与沈约政治观有关,《宋书·颜延之列传》云:“史臣曰:……而据笔数辠,陵仇犯逆,余彼慈亲,垂之虎吻,以此为忠,无闻前诰。夫自忍其亲,必将忍人之亲;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断可识矣。”此显示沈约忠、孝观念,他认为孝重于忠,而若要尽孝,就须惜命。《宋书·沈攸之列传》云:“初,吴兴丘幼弼、丘隆先、沈诞、沈荣守、吴陆道量,并以文记之才随攸之,及张永北讨,永一奔,攸之再败,幼弼等并皆陷没。”这些同乡文士陷没于战乱,沈约为之叹惋! 此乃沈约归隐的内在动因。

而如何经营居所,沈约也多有借镜。《宋书·张茂度列传》云:“茂度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张茂度财富自足,他精心营造安乐窝,其人隐居令人艳羡。

《宋书·沈庆之列传》云:“居清明门外,有宅四所,室宇甚丽。又有园舍在娄湖,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身为沈约同乡前辈的沈庆之建广厦以聚族而居,生活豪奢,可惜老臣功勋盖世,却在八十岁时候竟被赐死。

《宋书·孔灵符列传》记述:“灵符自丹阳出为会稽太守……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为有司所纠,汰侈靡费,也会招致困窘。

沈约《宋书》关注传主命运兴衰荣悴,目睹宋、齐朝人物,譬如谢晦、范晔、谢灵运、颜竣、谢朓等文士死于内讧,沈约《携手曲》云:“所畏红颜促,君恩不可长。”③在王权政治下,个人所谓荣华富贵,亦如幕燕釜鱼,转瞬化为浮云。深感宦海险峻,因此,沈约所向往的隐居,则去甚去泰,消减物

① 《晋诗》卷十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901 页。
② 《梁诗》卷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34 页。
③ 《梁诗》卷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22 页。

欲之膨胀,真正追求内心的宁静。沈约《东武吟行》云:“天德深且旷,人世贱而浮。”①人世一切,如梦如幻如泡影,沈约《郊居赋》云:“贵则丙、魏、萧、曹,亲则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雾而歇灭,与风云而消散。”然则孜孜以求名利,亦纯属无谓者也。

陶弘景《与从兄书》云:“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高迈。”②沈约与陶弘景交好,陶氏人生安排应得到沈约认同,而所谓浙东“好名县”,估计《世说新语》所渲染的“从山阴道上行”③,吸引陶氏目光。

《南齐书·王秀之列传》载王秀之为吴兴太守:“吴兴郡隐业所在,心愿为之。”而沈约家乡吴兴是隐居的胜地。《宋书·隐逸列传·戴颙列传》载:“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隐于何处?尚需斟酌。考察沈约《郊居赋》,其笔下之郊居究竟何在?按照《梁书·沈约列传》谓:“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可以判断《郊居赋》无须拘泥实处,而沈约所谓郊居,乃虚拟精神家园,属于一种希望达成的人生愿望,本在虚实之间耳。其“立宅东田”,按此“东”字,具有象征意味,东方,蕴藏着生命的能量,也预示着生命新的轮回和开端,谢安有东山,陶潜有东园、东轩、东户、东皋、东篱等词,此“东”字也浓缩了沈约心中“东土”“东人”之意识,他是大概念里的江南人,但是在荆、扬二州之间,他属于广义的扬州人士,而在扬部之中,他服膺“三吴”之美,“三吴”实为江南之首善,而其故乡“吴兴郡”更是“三吴”之第一乐土。

《宋书·王敬弘列传》记载,在高祖即位之前,王敬弘出为吴兴太守,而此前,王敬弘曾为天门太守,元嘉六年,王氏“表求还东”,元嘉十二年,他又上表曰:“臣抱疾东荒”;元嘉二十三年,他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闻达。先帝拔臣于荆蛮之域,赐以国士之遇。”而所谓“还东”,这是他梦寐以求者也,所以对担任“吴兴太守”,本传谓“旧居余杭县,悦是举也”。因此,身后“薨于余杭之舍亭山”,三吴之地,令他梦牵魂绕。在荆楚和三吴之间,他选择后者为终老之所。

沈约人生规划与王敬弘相似,按《梁书·沈约列传》,沈约助萧衍取代萧齐,可是梁朝初建,梁武帝却过河拆桥,于是沈约写信给朋友徐勉:“……崎岖薄宦,事非为己,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公私情计,非所了具,以身资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沈约“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地属“西土”,而荆楚既非故乡,且蛮风未消,《宋书·自序》沈约描述襄阳云:“襄阳地接边关,江左以来未有皇子重镇。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扞,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场。”写出此地险恶。沈约本借出仕以养家,然而离别故土,自东徂西,则颇不情愿,此陈情书写出沈约意在“傍此东归”,想依靠俸禄,最后叶落归根,不愿客死他乡。

永明末,一旦“出守东阳”,他已经感到“止足”,可是齐末混乱,人算不如天算。至于东阳一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却相对凋敝,《宋书·孔季恭列传》记载孔灵符提议赤贫者迁徙到“余姚、鄞、鄮三县界”开垦荒地,此说明东阳所属浙东地区较浙西开发较晚。所以,按《郊居赋》所云:“路萦吴而款越,涂被海而通闽。怀三鸟以长念,伊故乡之可珍。”萦吴款越,被海通闽,则与吴兴之地吻合,沈约更点出“伊故乡之可珍”,则更证明沈约晚年,意兴阑珊之余,唯有桑梓之地方是安顿心灵之归宿,“何安身于穷地”,指远离纷争漩涡,故此,沈约所谓郊居可视作人类普遍怀乡之意。

《郊居赋》包含沈约与谢灵运相左的意见,而自山居到郊居,沈约将谢氏抒情的场景从逶迤高山转移到平实大地,似可视作前者对后者的驳难,此最明显地表现在物欲观上。《郊居赋》明言:“不自已而求足,并尤物以兴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此所谓“昔士”无疑指谢灵运之流。《宋书·周朗列传》记载周朗报羊希书云:

---

① 《梁诗》卷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621 页。

② 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 页。

③ 《世说新语笺疏》,第 145 页。

"凡士之置身有三耳……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满,方杜长者之辙;谷稼是谘,自绝世豪之顾。"沈约评曰:"朗之辞意倜傥,类皆如此。"可见颇为欣赏其人隐居方式,周朗隐居展现精神充实,此与其简陋的物质生活形成对照。反观沈约《郊居赋》云:"李衡则橘林千树,石崇则杂果万株。并豪情之所侈,非俭志之所娱。"厌恶谢氏炫富,崇尚以俭为德;《郊居赋》又云:"本忘情于徇物,徒羁绁于天壤。"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为物欲所羁绊,赞美"颜箪食而乐在",因此,认同颜渊之"居陋巷",实际上对谢灵运聚敛无已之山居,是一种嘲讽。其《郊居赋》直指:"兢鄙夫之易失,惧宠禄之难持。"患得患失,是低层次考虑,内心平和方显智者通达;沈约又云:"阙投石之猛志,无飞矢之丽辞。"一扫谢氏跋扈自矜之作派,心态自持而稳健,颠覆谢氏《山居赋》唯我至上之狂放。

《郊居赋》写道:"眺孙后之墓田,寻雄霸之遗武。实接汉之后王,信开吴之英主。"抚今思昔,沈约东吴本土意识复炽,其中所潜藏意味,可谓深远矣。

Shen Yue's Writing Career: His Struggle for a High Status for the Chinese Southerners in the Cultural Domain

Wang Chun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ern Dynasties (南朝) in China witnessed an intense rivalry for literary eminence between the Southern native literary luminaries represented by Shen Yue (沈约, 441 - 513) and the member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who moved from Northern China like those from the prominent Wang's Family of Langya (琅琊王氏) and Xie'sFamily ofChenjun (陈郡谢氏). It was this intense rivalry that spurred Shen Yue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ical and poetical work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en Yue's *A Fu to Living in the Suburbs* (《郊居赋》) and his predecessor XieLingyun's (谢灵运 385-433) *A Fu to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山居赋》) reveals Shen's complex mentality behind his pursuit i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宋书》), *A Fu to Living in the Suburbs* (《郊居赋》), *A Fu to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山居赋》), Three-WuArea (三吴)

(责任编辑　　郑　园)